

政治生态与青年干部成长

主持人 李义天(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政治生态”的内涵、意义和重要性,为我们准确理解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活提供了准确、鲜明的指引。政治生态具有整体性、建构性、动态性和脆弱性的特征。身处其中的青年干部对于政治生态的延续性和规范性,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本栏目编发的三篇文章分别从青年干部与政治生态的辩证关系、青年干部的政治危机意识、青年干部的当代使命与人生价值等视角探讨了政治生态与青年干部成长的问题。青年干部需要有忠诚、担当、创新、自律的品质,才能促进政治生态的持续生存和健康发展;青年干部需要有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才能做到履行政治使命与实现人生价值高度统一;青年干部需要树立和增强政治危机意识,才能适应形势变化,胜任执政使命,优化现有的政治生态环境。

政治生态与政治生活的未来

——兼论青年干部与政治生态的辩证关系

■ 李义天

(中央编译局 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北京 100032)

【摘要】“政治生态”概念揭示出政治生活的整体性、建构性、动态性和脆弱性特征,揭示出政治生活的持续生存乃至良好发展的内在诉求。身处其中的青年干部对于政治生态的延续性和规范性,对于开创和建构政治生活的未来,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保持制度优先、贤能优先、开放优先的政治生态有助于青年干部的成长,实现其持续生存的基础目标。而忠诚、担当、创新、自律的青年干部群体则有助于建构规范的政治生态,实现其良好生存的高阶目标。

【关键词】 政治生态 政治生活 青年干部

“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政治生态”的内涵、意义和重要性,为我们准确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特征、

收稿日期:2016-04-27

作者简介: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政治学、哲学。

① 2015年3月6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西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定位与走向提供了准确、鲜明而又不乏生动的指引。从学理上说,“政治生态”要比“政治环境”更能揭示政治生活的整体性、建构性、动态性乃至脆弱性。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把政治生活看作一种“生态”,那么,“政治生态”必定蕴涵着政治生活持续生存乃至永续发展的内在诉求。这样,“政治生态”就不仅是对当前历史横断面描述,而且面向政治生活的未来敞开了大门。因此,当我们讨论“政治生态”时,就不能停留在静态的层面,而必须引入时间的维度,考察其自我更新的能力和方向。在这个意义上,制度资源的不断创新和干部队伍的后续建设,无疑成为政治生态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主要探讨政治生态的自我维护与政治生活的未来状况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作为自然生态之隐喻的政治生态

“政治生态”的概念是从“自然生态”的概念“借喻”而来的。当我们试图借用自然环境的某些特征来说明政治生活的某些特征,以及借用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和状态来理解人类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和状态时,我们便会使用“政治生态”这个概念。整体上讲,它所表明的含义是,人类社会的政治领域和政治生活,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类似于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环境和自然生活。因此,我们能够在自然生态中发现的特征,同样能在政治生态中发现;我们对自身在自然环境中的位置和关系的观点,同样适用于我们对自身在政治生活中的处境和功能的理解;而我们希望建设一个良好的自然生态的基本做法,同样也能为建设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提供启发。

“生态”概念最初出现时,被用于指称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自然界状况,即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的相互关系。因此,在最基础的意义上,“生态”指“自然生态”。但它又不是对自然界的另一种简单表述,而是一个为了凸显自然界的整体性及其内部要素(生物与其环境)之间联系性的特殊概念^[1]。因此,“整体性”是“生态”概念的首要内涵。于是,当它被借用到政治领域而以“政治生态”的形式出现时,它同样也是为了揭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政治生活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不仅有参与其中的政治主体,有相对刚性的政治制度,还有贯穿于政治主体与政治制度的政治习惯和政治风气。无论优良或败坏,政治生态本质上都是由政治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政治主体与政治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它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全面、综合的政治生活状况。概言之,政治生态“是关于政治主体、政治制度、政治过程及其互动,以及它们与社会环境之关系”^[2],而“政治生态理论就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来研究和观察社会政治现象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如果说一般生态学是以生物的生存条件以及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探求有机体之间以及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形式和规律,那么,政治生态理论则借助于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从政治体系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研究政治现象的形式及其发展”^[3]。因此,使用“政治生态”这个术语,我们将以整体的、联系的和均衡的视角去理解政治生活,而不会拘泥于个别要素并加以不恰当的突出。

正如“自然生态”区别于“自然环境”一样,“政治生态”也不同于“政治环境”。因为,“自然环境”不包括人类,是指人类周围、仅仅作为人类对象而存在的自然界,而“自然生态”则是指包括人类、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界的互动关联在内的整个生态圈。同样地,当一个人说“政治环境”时,把自己放在所述说的对象之外,而当一个人说“政治生态”时,则将自己也囊括其中。与“政治环境”相比,“政治生态”内在地依赖于行为者的主体因素——它既是政治主体的活动背景,影响甚至决定着政治主体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但同时,它也有赖于政治主体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对它本身的构成。因此,对于参与政治生态之中的政治主体来说,政治生态本身不

是先验的或既定的,而是经验的和生成的。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态当然会塑造什么样的政治主体,但反过来,有什么样的政治主体也会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的好与坏是被建构出来的,它与每一个参与其中的政治主体的作为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关联^[4]。

政治生态的建构性决定了政治生态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它会在特定区间内发生有弹性的改变;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它会突破既有的区间而发生根本的改变。不过,尽管如此,政治生态的整体性,却意味着这种改变总是以整体的形式出现:即各种要素不仅在某个历史时段构成整体,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段连续地、融贯地构成整体。因此,政治生态蕴涵着动态性的特征。对于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地方,因为政治生活作为人类实践的特定内容,在本质上就是多样而缺乏普遍确定性的;政治生态作为政治生活的具体表现形式,自然会体现这方面的特征。只不过,动态性否认的仅仅是“一以贯之”的固定性,却没有因此否认客观性或实在性。毋宁说,政治生态的客观性与实在性恰恰是通过动态化和多样化的历史而表现出来的。所以,承认政治生态的动态性非但不会取消它在当下的存在依据,反而可以为它在未来的持续存在提供证明。在这方面,“政治生态”概念要比在其他任何条件下都更加鲜明地体现出面向未来的特征。

然而,政治生态并不能确保自身始终处于进步状态。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①。这不仅说明,政治生态作为一种被建构的动态存在,必定面临着或变好或变坏的两种可能,而且说明,即便就这两种可能而言,“变得更坏”也比“变得更好”容易得多。正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既需要合理、周密、有效的政治制度,也需要忠诚、审慎、负责的政治主体。因此,政治生态变好,是一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综合工程。相比之下,破坏甚至瓦解政治生态,就算不是轻而易举的,也是机会多多的,因为只要有少数甚至极少数人违背政治规矩的行为没有得到有效制止或惩戒,那么整个政治生态就处于“有漏洞”的状态,进而,这种情况会像感染病毒一样将坏的示范效应传播开来。在这方面,自然生态面临着同样的风险,因为污染自然生态的因素一旦出现,我们就不能再说这是好的自然生态。也许消极因素没有居于主导地位,但与未受污染的状况相比,此时的自然生态的性质已经改变,所以,“政治生态是否遭到败坏”跟“自然生态是否遭到污染”一样,是一个“质”的问题,而不是“量”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脆弱性是伴随政治生态的建构性与动态性而来的必然特征。

二、政治生态的基础目标及其原则

政治生活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它会和其他生活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生活发生物质、信息的交换,即作为某种具有组织性和能动性的系统而发生内部与外部的互动。但是,对于何为政治生活的外部或内部,何为政治生态的边界,又有不同看法。一般来说,较宽泛的理解会把所有涉及或参与政治事务的行为者都认定为政治主体,因此,将所有与政治相关的事件、关系及状态都归于政治生态。相应地,那些与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方面则被视作政治生态的外部环境。根据这种理解,政治生态将典型地表现为“统治者—被统治者”、“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或“政府—公民”等二元结构。然而,与之相比,还有一种更加精细的理解方式,即将政治生态的主体限定在专业从政者的范围内,从而将其之外的各个环节定义为政治生态的外部环境。这种理解不是忽略普通民众的存在,更不是否定从政者之外的其他社会群体在现代政治之合法性来源

^① 2015年3月9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吉林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上的基础地位。毋宁说,这样做是为了强调和凸显专业从政者在政治生态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绝不仅是因为他们掌握着权力,而且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举止会给政治生态带来实际的较大影响。他们如果做得好,那么政治制度就会得到确立和执行,政治风气就会优良;他们如果做得坏,那么政治制度就会遭到违反和背弃,政治风气就会败坏。因此,将专业从政者及其活动理解为政治生态的核心甚至政治生态本身,这既是出于更大的期许,也是出于更大的担忧。既然他们对于营造好的政治生态负有更大的义务,对于导致坏的政治生态也负有更大的责任,那么,认真对待他们的政治权重,将他们(尤其是其中担负一定职务的领导干部)定位为“关键少数”,便是实事求是的,也是至关重要的。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政治生态的问题时明确指出,“要突出领导干部这个关键,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立正身、讲原则、守纪律、拒腐蚀,形成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示范效应,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①。

研究政治生态不仅要精准定位,把握其核心和重点,而且要结合(前面提到的)基本特征来探求什么是一个好的政治生态所应实现的目标。既然政治生态是以某些生态化原则和方法来理解政治生活,那么,政治生态最基础的要求就是要继续存在和持续存在。所谓“生生之为大德”。对于任何一种生物体/生命体,或者任何一种可以被比附为生物体/生命体的存在物来说,面向未来而“继续生存”,无疑是首要的基础目标,因为只有“继续生存”才可能实现“好的生存”,只有“继续生存”才可能证明自己的生存是“好的生存”。政治生态的所有基本特征——整体性、建构性、动态性——都必须服从于生存的延续性和持久性这一基础目标。至于说尽一切可能来抵御和消解其脆弱性,目的也是为了确保它在最基础的层面上能够“继续生存”。

如果政治生态的核心在于专业从政者(尤其是领导干部)及其活动,而好的政治生态的基础目标在于它的持续存在,那么,培养和提携合格的后续从政者(即促进青年干部的成长),就不再仅仅是党或政府的一项具体工作,而是关系到政治生活之未来的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也只有在政治生态的概念框架下,这项工作才会显示出这样的意义和属性。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怎样的政治生态才有利于青年干部的成长,从而有利于它自身面向未来的持续存在呢?简要地说,至少应该包含如下几条原则。

第一,制度优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②毫无疑问,规范的制度建设和严格的制度执行,对于建构良好的政治生态,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在这样的制度条件下,政治生态将会有利于参与其中的每一个政治主体。而对青年干部来说,坚持制度优先的政治生态还有着额外的意义,因为与年纪较大的精英和骨干相比,青年干部大多会因自身年龄和阅历的限制而处在一个学习、效仿甚至摸索的阶段,此时,明确而正确的制度能够帮助他们尽快“进入角色”,知道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又该如何规划自己的成长路径。如果一个青年干部身边全是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潜规则”大行其道,而那些明令公布的制度却纲纪弛,那么,即便他不同流合污,至少也会因此感到无所适从。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规范的并且得到有效运行的制度给青年干部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也为他们提供了合理的发展预期。况且,对青年人来说,追求进步和自我完善是必然的目标。这不是因为他们心高气傲,而是因为人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他们处在一个向上攀升的趋势中。而好的政治生态,绝不是要克制或压抑这种趋势,而是要通过恰当的制度设计,将他们的这种态度和这

^① 2015年3月9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吉林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② 2014年10月23日,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股干劲沿着正确的方向、以合理的方式调动出来、发挥出来。对于青年干部来说,他们需要这样的政治生态;而对于政治生态来说,也只有如此,才能确保其持续存在。

第二,贤能优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干部,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要改进考核方法和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①这段重要论述不仅适用于一般的干部工作,更适用于青年干部工作,因为随着我国教育质量的整体提高、公务员选拔制度的不断完善,那些成为专业从政者的青年人在素质和能力上是有保障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希望自己的能力获得认可,更希望自己取得相应的成就。以能力为本位、以贤德为优先,这对青年干部来说,不仅是一个事关公平公正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分清主次、把握根本、避免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的问题。坚持贤能优先,好的政治生态将激发青年人的素质、能力和热情,引导他们将主要精力投放到凭借脚踏实地地努力而推动事业进步上去,从而最终实现政治生态自身的持续发展。

第三,开放优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改进工作作风,就是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②这说明,建构好的政治生态,培养一支精干、廉洁的干部队伍,其宗旨是为了让这支队伍更好地服务人民,让由这支队伍构成的政治生态向支撑他们的外部环境开放,让由此形成的好的政治生态所具有的正能量辐射和带动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研究者指出,开放是一个好的政治生态系统所不可或缺的过程:“政治体系的对外开放,使得它与社会环境之间建立起永恒的物质、信息与能量的互相输出与回馈关系,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不断处于协调和调适的动态状态,形成有机联动和同步进化。政治体系内部诸次体系之间的相互开放,使得政治体系内部形成大小不等的相互开放的循环系统,物质、信息与能量在诸次体系间互相输出与回馈,不断调适各自的关系,使得政治体系自身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协同共进,共同构成整个政治体系的整体有机性。”^[5]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进入政治生态系统的青年干部能够不断地意识到自己的根基和来源,不断地将自己通过这个系统所获得的东西予以反哺;而那些尚未进入的青年人,也可以通过开放的状态而被吸纳,成为政治生态的新鲜血液。不仅如此,政治生态之所以需要开放,还因为开放意味着它对于自身未来的可能性的开放,而这些未来的可能性,主要是由参与其中的青年人所承载和执行的。因此,一种好的政治生态,亦即一种确保自身延续的政治生态,必然允许开放和创新,必然鼓励青年人的尝试或试验。这是政治生态自我更新的规律性和必要性使然。

三、政治生活的未来与青年干部的能动性

政治生态的首要目标是实现面向未来的继续存在,但它的终极目标却不限于此,而是实现

^① 2013年6月28-29日,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② 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面向未来的好的存在。尽管“继续存在”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它是“好的存在”，然而，要真正达到全方位和深层次的“好的存在”，除了符合延续性或持续性这一基础目标以外，还必须在规范性与合法性等高阶目标上有所作为。既然政治生态具有建构性，那么，参与其中的政治主体的能动性便成为关键因素。政治生态不是静止、固定或纯粹对象化的，每一个政治主体并不外在于政治生态。政治主体的作为本身就是对政治生态的建构，本身就要为政治生态的好坏承担责任。在这方面，青年干部的能动性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所实施的建构活动，不仅会跟其他人一样影响到政治生活的当前特质，而且随着他们的成长，还会影响到政治生态的今后发展。如果说上一节的讨论主要是从政治生态对青年干部的塑造作用出发，剖析前者如何才能实现其延续性的基础目标，那么，这一节的讨论将主要从青年干部对政治生态的建构作用出发，考察他们作为专业从政者需要具有怎样的特质才能使政治生态实现其规范性的高阶目标。

实际上，关于领导干部需要具备什么特质，习近平总书记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领导干部要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坚持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对上对下讲真话、实话；要坚持原则、恪守规矩，严格按党纪国法办事；要严肃纲纪、疾恶如仇，对一切不正之风敢于亮剑；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正确行使权力，在各种诱惑面前经得起考验。”^①概言之，就是要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② 这些方面当然适用于包括青年干部在内的所有相关人员。结合青年干部的特点进一步考虑，我们可以期待他们做得更好，因为他们所做的每件事都将更多地影响到政治生活的未来。

第一，毫无疑问，为了政治生态的持续发展，开创政治生活的未来，青年干部必须保持思想上的定力和行动上的连贯性。在这个意义上，“忠诚”是不可或缺的首要品质。这种忠诚不是对某个个人的忠诚，而是对事业的忠诚，对这份事业所蕴涵的价值理念与政治信念的忠诚。因此，它不是依附性的忠诚，而是公共性和反思性的忠诚。只有心怀这样的忠诚，才会在行动上持之以恒。只有心怀这样的忠诚，才能保证政治生态既在平常条件下不断延续，又在非常条件下经得起考验；也只有心怀这样的忠诚，才能确保青年人在认同的前提下遵守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对组织的安排和决定表示服从。一般来说，青年干部作为资历较浅、职级较低的群体基本上能够做到这一点，但值得区分和注意的是，有的青年干部的服从并不是出于忠诚或认可，而是出于性格的内向或软弱，甚至是出于自我私利的精打细算。建立在后两者基础上的服从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青年干部表面上看起来服从纪律或决议，维护整个政治生态的稳定和延续，但是，他们的性格软弱却无助于政治生态以一种有活力、有朝气的方式保持稳定和延续，而那些私底下的精心算计则更是为政治生态的不稳定和最终败坏埋下了伏笔。因此，只有忠诚，而不是软弱，更不是投机钻营，才能为政治生活赢得高质量的未来。

第二，为了建构好的政治生态，开创政治生活的未来，青年干部特别需要具备执行力与担当精神。这不仅是一般意义上推进事业的必要条件，而且，对当代中国的青年人来说，它还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 13 亿多人口的国家深化改革，绝非易事。中国改革经过三十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③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改革有可能因为利益的固化而停滞的关键时期，只有行动而不是空谈，只有担当而不是退缩，才可以将党和人民的事业向前推动。这时，青年干部本应具有朝气与锐气，对于现状永不满足的志向与热情，以及他们相对既得利益的距离感，都使得他们足以成为政治生态中最能响应时代召唤、承担历

^① 2014 年 6 月 30 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

^② 2013 年 6 月 28 - 29 日，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③ 2014 年 2 月 7 日，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的讲话。

史使命的群体。同时,这也再次说明,那些缺乏魄力、缺少担当、混一天是一天的“老好人”,那些缺乏思考、缺乏干劲、只想着稳稳当当熬年头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那些年纪不大却暮气沉沉的青年干部,是不适应这个时代的节奏和要求的。可以说,青年干部的态度和激情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大业能否走向深入;青年干部的视野和抱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中国的政治生活究竟可以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和水平。

第三,建构好的政治生态,开创政治生活的未来,不但要在“战略方向”上深入推进,而且要在“战术技巧”上有所突破。因此,它亟须在制度建设和工作方法上有所创新,而青年干部接收信息量大、接受新鲜事物快、对生活现状反应灵敏的特点,无疑有助于他们在工作中保持开放的视野,吸纳来自周边环境的新观念、新思路和新做法,从而改善政治生态的现状。尤其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经济交往方式、观念互动方式乃至日常思维模式都有了很大改变。政治生态如何适应社会生活基于互联网的整体变化,已然成为事关政治生态与政治生活发展的重要课题。这个课题理应由自身便是通过与互联网打交道而成长起来的青年干部群体来承担。试想,如果青年干部都不能顺应和把握时代潮流,都不能利用和发挥自身的优势去观察、理解和介入新的时代状况,那么,其他年龄层次的专业从政者就更不容易做到这一点了。如果这样,就不是政治生活的内部出了什么问题,而是政治生活的整体都可能与社会生活相脱节,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未来可言。

第四,建构好的政治生态,开创政治生活的未来,还需要青年干部跟其他专业从政者一样,从严要求自己、管理自身。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这些年来,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四风’问题越积越多,党内和社会上潜规则越来越盛行,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受到污染,根子就在从严治党没有做到位”,但是,只要“我们坚持言必信、行必果,认认真真管,实实在在严”,只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而不是管一阵放一阵、严一阵松一阵,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不至于使小矛盾积重难返、小问题酿成大患”^①。对青年干部来说,这方面的教训尤其需要认真汲取。固然,由于年龄、资历和职务等方面的原因,看起来好像青年干部没有掌握多大的权力,不会遇到多大的诱惑,也不会犯下多大的错误。但是,一方面,“不会遇到多大的诱惑”不等于“不会遇到诱惑”,“不会犯下多大的错误”不等于“犯下的错误就不是错误”。相反,当一个年轻人成为专业从政者时,当他从“没有诱惑”到“有所诱惑”,从“不曾犯错”到“犯有错误”时,即便这些诱惑和错误非常轻微,那也是“质”的改变。事实证明,所有最后犯下不可补救的错误的失足之人,都是从年轻时的点滴失误开始的。另一方面,正是因为青年干部的年龄不大、职务不高,所以他们还会有更长的路要走,也就是说,他们还会在更长的工作时间、在更大的发展空间中面临各种诱惑,所以,越是青年干部,反而越是会有考验和挑战在等待着他们。如果在这些方面放松了警惕和约束,那么,这不仅是对他们自身未来的不负责任,而且是对整个政治生态的未来的不负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青年干部要更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生态的重要论述,以长时段眼光、以大局意识、以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来思考自身的定位与使命。

[参 考 文 献]

- [1] 萨克塞:《生态哲学》,文 韬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
- [2][5] 刘京希:《政治生态学理论体系建构刍议》,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4期。
- [3] 桑玉成:《政治发展中的政治生态问题》,载《学术月刊》,2012年第8期。
- [4] 夏美武 金太军:《政治生态学:理论原则、价值与现实意义》,载《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2期。

(责任编辑:王建敏)

^①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